

看不見的跨國勞動

讀《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國際事務處境外生招生組
麥智軒 助理管理師

讀研究所的時候，老師帶著我們讀了許多有關移民的著作，比如討論移工（Migrant Worker）、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tion）和新二代（New Second Generation）、難民與尋求政治庇護者（Refugees & Asylum Seekers）的內容。在「亞洲移民專題」這堂課裡面，我學到的是：「移民」問題比我們想像得還來的複雜。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正是聚焦於「跨國勞動」的問題，以及怎麼樣築起一個台灣人難以接觸的「地下社會」。對我來說，簡永達的書作所帶來的衝擊，不亞於《跨國灰姑娘》，其對移工議題的深入剖析，在當下顯得更是難得。

簡永達曾以記者身分在《報導者》工作多年，任職期間在台中第一廣場（後來2016年更名為東協廣場）進行現場調查，後來甚至租下大樓內一間套房展開長期採訪。簡永達坦言初入移工議題時他尚屬門外漢，但長期與移工接觸、深入對話以及跨國調研，使他逐漸打開這個世界的大門。經過反覆重寫與追蹤職災等議題後，不僅展現出台灣移工真實的血肉人生，更呈現出移工們所構築的地下社會。難能可貴的是，他以銳利的視角從制度與國際政經的角度，剖析台灣三十年來從嚴格管制到大開門戶的移工政策演變，並解釋國家、外交、資方與勞權等多重因素如何交織影響政策取向。就像作者一直想強調的那個比喻——「移工有點像是在彈珠檯上四竄的彈珠，身上受各種力量牽引而難以抵抗。」（見3.1，P.227）

書中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地下社會」以第一廣場的田野調查為起點，探討族群經濟的形成以及台灣早期以勞動商品化為本質的移工政策，並追溯到2005年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後，人權議題首次納入政策考量，顯現出移工在勞動力與人性間的矛盾；第二部分「危險之島」聚焦於移工面臨的職災風險與補償機制，透過一名泰國移工之死和移工宿舍大火等事件，呈現出台灣如何成為移工眼中的「危險之島」，並探討移工回國後卻仍選擇再度出走的原因；第三部分「異鄉家人」則關注個別移工的微觀故事，強調他們並非僅僅是人力仲介商眼中的商品，而是具有能動性，能在台灣重塑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第四部分「人權大浪」則從市場競爭、雙邊國家監管到國際品牌介入治理海外供應鏈勞權等多重層面，檢視國際間搶工競爭與仲介行業變化如何共同改變移工的處境。

第一部分的前兩篇：〈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與〈透明的小孩——在臺無國籍移工寶寶與異鄉生養難題〉，作者細膩地描繪了第一廣場的景象。這座十三層樓

的大樓成為全臺移工最密集的據點之一，每天見證上萬移工的進出，展現出強勁的消費動能與現金流。不僅是金錢的寄送，其聚集效應亦為周邊商圈帶來驚人的經濟效益；然而，這片繁華背後卻隱藏著族群隔閡與歧視——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等移工各自佔據不同區域，彼此間存在偏見與隔閡，而且階級差異也格外明顯。

〈透明的小孩〉深入探討移工家庭內部的矛盾與張力。每逢發薪日移工們紛紛湧向匯兌商家，這不僅反映出他們努力賺錢、奉獻家庭的精神，也彰顯出他們在台灣社會中的重要角色。簡永達同時剖析了移工子女的困境：在屬人主義國籍制度下，即使在台出生，移工子女依然難以取得合法國籍，甚至可能淪為無國籍兒童。透過引用國際組織的數據與學者觀點，書中指出這一現象正成為檢視一國人道價值、經濟結構與移民政策的重要晴雨表。

作者回顧台灣針對移工婚姻與懷孕所採取的嚴苛管制措施，揭露國家如何以防止移工變相移民為名介入她們的私人生活與身體自主。儘管在國際輿論和國內壓力下，這些禁令逐步解除，但移工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標籤始終難以擺脫，其對愛情、生育與家庭的渴望也往往被迫隱藏。從「古墓女童」事件到外籍新生兒登記政策，每一細節均映射出台灣轉型過程中對移工權益的忽視與矛盾。

前兩章簡永達的筆觸讓我聯想起香港學者麥高登（Gordon Matthews）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麥高登以長期田野蹲點，細緻描繪重慶大廈內部的經濟運作、族群互動及其與國家、國籍之間的關係；而簡永達同樣以真實採訪與數據分析，挑戰傳統僅將移工視為「廉價勞動力」的刻板印象。他不僅展現出移工如何支撐台灣的經濟運轉，更反思在全球化與人口結構變遷中，一個國家對外來勞工的接納及建立人道主義傳統的迫切需求。

第三章〈移工政策三十年，從禁絕到依賴〉則是從歷史與經濟角度說明：外籍移工數量的激增並非偶然，而是全球化與台灣勞動市場轉型的必然結果。文章從上世紀八零年代台灣面臨嚴重缺工談起，指出當時製造業與營建業因嬰兒潮結束、低生育率與經濟轉型而使勞動人口大幅縮減，加上美方要求改善勞工權益及台幣升值等因素，使得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產業陷入困境。1989年10月，正值台灣經濟起飛之際，政府為推動重大建設，通過「十四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首次以專案方式引進營造業移工，拉開了移工來台的序幕。

在缺工壓力下，不少工廠業主私下引進以觀光簽證入境、逾期居留的外籍勞工。儘管這些勞工並非從事非法工作，但當時政府嚴格打擊非法外勞，堅持不引進外籍勞工。作者引用西德引進「客工」的案例，警示台灣原本暫時補充勞力的外勞，因長期滯留而可能引發社會與族群矛盾，這一經驗成為台灣政府在產業轉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隨著產業轉型與資方壓力日增，台灣政府態度逐漸轉變；當主要企業因缺工威脅停止投資甚至將生產基地移至中國時，政府在外交與經濟雙重壓力下，不得不考慮合法引進外籍勞工。1992年，政府通過《就業服務法》，建立了以限期、限量、輪替為特點的

客工制度，規定必須在國內招募不到勞工方可申請外勞，並將居留期限嚴格限定在最長兩年，以滿足勞動力需求，同時避免移工長期定居引發的社會問題。

簡永達讓我認識到一個陌生的詞——3K五級制。台灣的「3K五級制」是根據《就業服務法》對外籍勞工從事製造業體力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所設立的一項分級管理制度。該法條規定，外籍勞工從事直接製造產品或與製造相關的體力工作時，必須符合一定的工作環境要求，而這些工作大多涉及異常溫度作業、粉塵作業、有毒氣體作業、有機溶劑作業、化學處理、非自動化作業及其他特定製程。由於這類工作具有極高的環境風險和勞動強度，因此通常被歸納為「3K產業」，其中「3K」源自日文，分別代表骯髒（Kitanai）、危險（Kiken）及辛苦（Kitsui）。「3K」的工作許多正是台灣人不願意做的。

隨著產業對廉價勞動力需求不斷擴大，政府逐步提高外勞名額，從最初的三萬兩千人迅速激增至三十萬，實際來台人數由三千人暴增至二十萬，成長了六十三倍。這股外勞浪潮既受到產業界的歡迎，也引發本地勞工強烈反彈。眾多工人及工團對外勞取代本國勞工表示不滿，陸續發起遊行抗議，要求政府制定「落日條款」以限制外勞進一步擴張。儘管外勞問題引發諸多爭議，政府與資方普遍認為外籍移工是台灣經濟不可或缺的勞動力補充。他們不僅彌補製造業與建築業的體力勞動缺口，也為家庭照護等服務產業提供必要人力，使台灣人得以專注於更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正因如此，經歷數次政局變動後，「外勞」政策最終穩定下來，成為支撐台灣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書中另一篇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臺灣學抗爭——一堂在臺移工的公民課〉。該章從台灣工人歷史抗爭的脈絡切入，描述了解嚴前後勞工如何依法爭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罷工潮，爭取加班費、年終獎金與合理工時等基本權益。為緩和勞資衝突，政府成立了勞工委員會，並於2014年升格為勞動部，以調節不斷升溫的勞動爭議。相比之下，移工的境遇則截然不同。他們並非僅因逃離而解約，而是在制度壓迫下單方面解除勞動契約以擺脫仲介控制，甚至被部分越南移工戲稱為「自由人」。於是有學者指出，合法移工因循契約反陷入「合法奴工」境地，其薪資與勞動條件遠不及冒險成為無證移工者。台灣嚴格的客工制度僅允許移工短期居留，政府與經濟部共同決定引進產業與人數，並透過各項限制措施將簽證權牢牢綁定於雇主手中，進一步剝奪了移工轉換工作的機會與「用腳投票」的可能。

在這樣的體制下，部分移工選擇成為無證移工以逃離政府掌控，但卻失去了健保、合法申訴等基本權利，常因被視為「逃犯」而面臨警方盤查甚至致命暴力的風險。書中以2017年阮國非事件為例，揭示移工在逃離過程中所承受的恐懼與生死危險，該事件後來更被拍成電影《九槍》，而簡永達也受邀擔任製作團隊的研究員。另一方面，雇主與仲介商則利用制度漏洞，以高額仲介費使移工背負沉重債務，進而削弱其爭取權益的能力。儘管雇主常以成本與補貼辯解，但實際上移工薪資遠低於本地工人，缺乏晉升與加薪機會，致使他們在勞動市場中更易受到剝削與控制。

此外，台灣工會運動長期受政府與資方操控，原有機制甚至排斥非本國籍勞工，直到2010年國籍限制取消後，移工才有機會參與並自組工會。雖然目前登記的移工工會數量不多，但這為移工爭取權益提供了新平台，也象徵著他們從邊緣逐漸走向公共參與。在個人層面上，移工的經歷也悄然改變了他們對民主與公民參與的認知。阿高從最初僅為賺錢而來，後來主動投身各項社會運動，表達對民主政治的認同與期盼；而阿輝則在經歷沉默與忍耐後，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抗爭改變自身命運，甚至在離臺前特意參訪歷史紀念館。從這兩位移工的故事，作者藉由了解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也從他們身上獲得一堂別具意義的公民課。

透過深入的田野調查與細膩敘事，簡永達在《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中，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充滿矛盾、掙扎卻又蘊藏希望的地下世界——一個移工在異鄉突破制度限制、相互扶持、重構自我認同的社群。

回望台南，我們隨處可見移工留下的痕跡：火車站附近早已聚集了數家東南亞超市，如 BigKing、Index 及 RJ Mart，這些標誌性商號正訴說著移工生活的一部分。據統計截至 113 年 12 月，台南移工總人數已達 61,900 人。台南的移工多為產業勞工，分布於永康、保安、官田、麻豆、仁德、安平等工業區，從事飼料包裝、紙箱切割、成衣製造、電鍍焊接、建材搬運以及遠洋漁撈等工作（宋家瑜，2017）。他們的辛勤勞動與汗水不僅支撐著城市運作，更將本地生活與移工勞動緊密相連。早期的工業區大量引進外籍勞動力，使得移工在火車站前自發形成了一個涵蓋飲食、住宿與交通等功能的消費圈；而鄰近的台南公園，則成為他們週末戶外活動的重要據點，移工在此休息、嬉戲、聚會，共同編織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活畫面。

簡永達的觀察告訴我們，這群跨國勞動者如何在壓迫與排斥中築起屬於自己的地下社會，挑戰外界對他們的刻板印象。那麼我們是否也能放慢腳步、多花些心思，關注並理解身邊這些在困境中努力生存、互助重構生活世界的移工們？

